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史海钩沉】	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	陈宝德·李学超
【档案揭秘】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李根清
【书刊动态】	徐景贤《最后回忆》后记	葛蕴芳
【当事者言】	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	徐景贤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海钩沉】

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

· 陈宝德·李学超 ·

广东省阳江县的乱打乱杀现象始发于1968年1月5日。该日，程村公社中平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黄某主持召开群众大会，自立法庭，宣判枪杀两名地主。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向县军管会副主任原某汇报，但他不制止。3月31日，新洲公社副书记黎某在蹲点的龙潭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斗打怀疑参加反革命组织、地主出身的黄万齐，致其重伤后，令民兵执行枪决。同期，新洲公社东安大队对一名从事副业的人搞逼、供、讯，迫其供出乌有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组织，即分别通知这一“组织”人员所在大队，这些大队枪毙了受株连的人。对此，县军管会也知道的，但不追查。

1968年5月11日至15日，湛江地区在海康县召开由县领导带队参加的全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会议（简称“海康会议”），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简称“反三右一妖风”）为主题。这次会议精神，提出“反三右一妖风”，要把矛头对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一切阶级敌人，绝不能把矛头对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其实质是在农村把斗争对准地、富、反、坏、右人员。会后，由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派性武斗仇杀转向了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人员的残酷杀戮。贯彻“海康会议”精神，是阳江个别地方乱打乱杀现象演变为全县性乱打乱杀成风的直接原因。

5月15日，“海康会议”结束回阳江的当天晚上，县军管会主任于某召集参加会议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开会，做了一个多小时报告。于某在报告中夸大了阳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指出要反掉右倾保守，必须“敢”字当头，对四类分子要摸底排队，发现有破坏活动要狠狠斗，对资产阶级势力要狠狠斗。各公社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规模要大，声势要猛，行动要迅速。

各公社革委会主任回去后，迅速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布置对四类分子摸底排队，对认为表现“坏”（实际不一定如此）者开展批斗、殴打、杀死、枪决，全县乱打乱杀现象愈演愈烈。5

月24日，县军管会发出《关于召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大会的通知》，全县乱打乱杀现象加剧。至6月1日前，“海康会议”精神贯彻半个月，全县不完全统计，被枪决打死的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子女178名。全县总共25个公社，有17个开始乱打乱杀，最严重的是织篢、溪头、程村、塘口4个公社，其次是大沟、雅韶、蒲牌、北惯4个公社。当时织篢公社革委会决定让各大队开展批斗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子女，仅几天打死和枪毙四类分子及其子女55人。溪头公社各大队7天内枪毙、打死和自杀52人，并作为成绩向县军管会报告。

在乱打乱杀已成风的情况下，县军管会的领导积极执行“反三右一妖风”政策，表扬打死人的公社阶级斗争抓得好，批评未打死人的8个公社抓阶级斗争不力、保守，继续夸大阶级斗争严峻性，继续夸大自己队伍内部的右倾，并于6月1日至15日召开2800多人参加的“反三右一妖风”四级干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大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组织群众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要进一步加强群众的专政，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要批判自己队伍内部右倾保守思想。会上表扬溪头公社4月26日的做法（指炸溪头“红司”司令部小楼事件），同时指责了未有行动的公社、大队，说：“敌人磨刀，你们睡觉。”这次会议本质是在大规模乱打乱杀已成风的情况下继续鼓劲乱打乱杀。

会后，全县各公社都召开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大会，贯彻会议精神，各公社在会上都组织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和某些所谓有“罪”的群众进行批斗、专政，在批斗中，均有打死或枪毙人的，多则12名，少则1名。比如在程村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当场被打死12人。这样，就形成了全县乱打乱杀高潮。至7月23日，全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其中枪毙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杀95人，乱打乱杀遍及全县。

1968年中央“七三”“七二四”报告下达后，县军管会才开始派员制止，乱打乱杀才减少，但不少地方仍不听制止而背着杀人，杀人行为依然在肆虐，至1969年1月中旬底才停止。乱打乱杀长达13个月时间，死亡909人，其中被枪杀的330人（内中有23人是在派性武斗中被打死的），被斗争打死的374人，自杀的205人。加上1970年至1971年“一打三反”自杀61人，共死亡970人。这970人中，地、富、反、坏、右人员435人，地、富、反、坏、右人员子女316人，一般群众111人，干部（含教师）37人，职工62人，其他人员9人。当时，全县共25个公社都出现乱打乱杀事件，最为严重的是程村、溪头、塘口、织篢等公社。程村公社就杀死90人。全县有乱打乱杀行为的大队233个，占全县大队总数373个的62.5%。

在乱打乱杀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极端残忍、野蛮，有用枪支射死的，有用锄头锄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头砸死的，有用匕首刺死的，有用禾叉叉死的，有用鞭炮炸死的，有用煤油烧死的，有用河水淹死的，有直接活埋或被打得半死后活埋的，还有用铁线穿鼻子的。

导致乱打乱杀这一灾难性局面的政治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对“阶级斗争思想”的迷信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全社会对法律的践踏和蔑视，是“群众专政”对法律的践踏和蔑视，是“把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全部、彻底消灭干净”的政治口号，是对“阶级敌人斩草除根”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是导致地、富、反、坏、右家属子女被杀的重要原因）。

导致这一灾难性局面的直接原因是，“海康会议”精神是极“左”的，当时阳江县军管会主要领导和部分副职思想是极“左”的，全县大部分公社、大队两级党政组织思想也是极“左”的。对乱打乱杀现象，县军管会开始是放任的，后来是纵容、支持、鼓励的（1968年5月

间，已靠边站的县公安局局长覃兰川向保卫组军管小组副组长陈某汇报一部分公社、大队出现乱打乱杀情况，并提出采取措施制止时，陈某说：“打死几个坏家伙算得了什么？”从开始至高潮，从未开过一次制止乱打乱杀专门会议，直到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下达，才开专门会议制止）。当时由于全县大部分公社、大队两级党政组织思想是极“左”的，致使“海康会议”极“左”精神得到极力贯彻。全县性的乱打乱杀行为实际上是在县、公社、大队三级组织指挥下以“全部、彻底消灭干净阶级敌人”名义进行的。

导致这一灾难性局面的人性原因是，在“全部、彻底消灭干净阶级敌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口号鼓动下，一些人人性泯灭、兽性大发，借“革命”“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名义，行杀人、强奸、越货、复私仇之实，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包括襁褓里的婴儿也杀害（共杀316人），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同时，相邻的阳春县乱打乱杀行动早（始于1967年9月23日）、规模大、手段残忍、致非正常死亡多（2664人），也给阳江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当时，阳春河口公社上双、龙门等大队，不用经过批准就可随便杀人，更为残忍的是，他们将当地定性为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后代（其中有不少是吃奶的小孩，还用带背着）用长长的麻绳绑成一串，勒令其站在河边，或是开枪扫射，或是用棍毒打，并把他们扫射死后的尸体和毒打后的被捆绑的活人推进河里，惨无人道，致使漠阳江遍布尸体。

回首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历史，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惨痛的。这教训就是：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任何美化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的无知；左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根深蒂固，任何时候都必须防止左；必须重新审视“人道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理论”中的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和尊严至高无上的思想是正确的；必须深刻认识人性的恶，必须运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而绝不能用群众运动去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摒弃人治，实施法治，必须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理论；必须坚持建立和谐社会理念，依法理性地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彻底否定用“阶级斗争理论”解决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为中共阳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11期

~~~~~

## 【档案揭秘】

###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 李根清 •

#### ◇ 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

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中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中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〇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〇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〇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〇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么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 “听文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

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 ◇ 林彪与叶群

林彪与叶群之间的关系用林彪给叶群的一幅题词概括也许是恰当的，那就是1970年初林彪写给叶群的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后来，林彪又把后一句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幅题词中，林彪称叶群为“爱妻”。这是在林彪写给叶群的诸多题词中第一次使用“爱妻”这个词。

叶群对林彪这个题词甚为珍视，叫人装裱后挂在墙上，后来又镌刻在砚盒上。不久，叶群回赠林彪一幅：“为有恩情报不尽，他年相随到黄泉”。

林彪以往给叶群的题词，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都是告诫叶群要严格约束自己，不要逾越规矩，唯独这次对叶群谈及生死，叶群也马上回应定将相随黄泉。

从林彪、叶群1942年7月结婚到1971年9月13日同机身亡异国他乡，两人做夫妻二十九年。但叶群不止一次流露，她跟林彪“并不幸福”。林立衡骂叶群是坏人，但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女人，叶群也是不幸的。”



战争年代的林彪一心关注战争，精心指挥打仗，心无旁骛，对叶群的冷落不言而喻。1938年那次负伤，林彪捡回了一条命，但却造成了终生不愈的病痛，怕这怕那，又讳疾忌医，加上性情孤傲，不善交际，与性格活泼、不甘寂寞的叶群形成鲜明对照。1964年年底我到上海后，渐渐发现林彪与叶群并不同居一室。林彪住楼下，叶群住楼上，而那时林彪刚五十七岁，叶群才四十四岁。不久搬到苏州南园，林彪住南，叶群住北，后来叶群干脆搬到另一栋楼房去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各自的卧室分别在工字房的东西两端，中间隔着几十米远的数重房间。

林彪、叶群各自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林彪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晚上9点多钟睡觉，一年四季，按时作息，从不熬夜，且只要躺下，便不许打扰。叶群却是“夜猫子”，上午10点以前不起床，凌晨2点以前不睡觉。赶上开会，清晨四五点钟才睡下，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躺在床上还要王淑媛给她做头部按摩，陪她“瞎”聊，时常聊得王淑媛打瞌睡，脑门磕在叶群脑门上。

林彪的饭菜单调乏味，从不讲究。叶群每餐四菜一汤，花样常新。山珍海味，南北佳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在大连住时，一天她特地把饭菜端到林彪客厅，边吃边对林彪说：“这里的扇贝很有名，我叫他们给你做点鲜贝肉尝尝怎么样？”林彪摇摇脑袋说：“你吃吧，我不行。”

林彪一家四口人从不吃一个锅里的饭，人人有自己的食谱，人人有自己的餐桌，人人有自己的饭点。我从没有见过林彪一家人在一起吃过饭。偶尔见林立衡或林立果端着饭碗在林彪跟前边吃边聊。林立衡、林立果都很尊敬林彪，“爸爸”叫得很甜，但对叶群却不那么亲近。他俩跟工作人员一样，只叫叶群“主任”或“叶主任”，从不叫叶群“妈妈”。林立果背后称叶群为“叶胖子”，甚至“他妈的，叶老胖”。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和叶群走到了一起。

林彪从不游山玩水，从不穿行于闹市，叶群却爱动爱玩。她跟随林彪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出门走一走，看一看，景区、商场都是她爱去的地方。上海、苏州、杭州的景点都被她看遍了。1965年4月到无锡只住了一个星期，她也抽时间到梅园、蠡园、鼋头渚去玩。每次游览回来她都会到林彪那里滔滔不绝，把看到的、听到的讲给林彪听。林彪不反感叶群说这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林彪喜欢叶群活泼开朗，叶群给林彪讲笑话常使林彪乐不可支。但林彪又受不了叶群“说事”时的罗嗦，常常制止叶群说话，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许叶群见面。林彪相信叶群的精明，一些文件放手让叶群“把关”，但是又不喜欢叶群的张扬，限制她外出，限制她串门，限制她开会。1967年至1970年几年间，林彪除时常口头训诫叶群外，还多次口授“座右铭”让我写下来挂在叶群床头。比如“少吃多餐”；“开朗、愉快、活泼”；“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在叶群被“假党员”困扰时，给叶群写“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庐山会议后，又给叶群鼓气：“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都充分表现出林彪对叶群既喜又烦、既亲又疏、既放又管的心态。

#### ◇ 庐山会议后与林彪的几次见面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

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们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那天叶群把我找去，见到我，一反过去颐指气使的神态，一副异乎寻常和蔼可亲的样子，忙从沙发里站起身主动跟我握手，招呼我坐下，问这问那，还问我身体怎么样，对象谈得怎么样。这种反常举动使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叶群绕了一个大弯子后说：“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出事了，他搞的一个材料捅了篓子，主席批评了他，首长和我也批评了他。陈伯达是个文人，爱写文章，难免出差错，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以后你若是听到什么，不要紧张，只管安心做好工作，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最后叶群问我：“你那里保存有陈伯达的书信、题词吗？”我答：“没有。”叶群说：“好吧。如果发现陈伯达的信件、题词直接交给我。”当时，我揣摩叶群的心思，是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那天，我发现陈伯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已经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消失了。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过了新年，林彪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接着口述道：“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当我照林彪吩咐去叶群那里取条幅准备写字时，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那时，林彪就让我给叶群写过“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这样的话。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又向叶群传达类似的信息，说明在1971年到来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我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我把文件送到时，她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当我退出的时候，只听林彪厉声吼叶群：“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当时我感觉，叶群是在林彪面前搬弄是非惹得林彪不耐烦，实际上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除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外，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个人的错误进行批评。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但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总结。他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把我找去交代说：“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我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当这些文件、电报再回到我手里时，我从上面看不到任何

向林彪报告过的标志。

一天我给叶群送文件，只听她在电话里对人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两次安眠药，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啊，历史上都是支持的……没有想到啊……”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很抢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林彪认为，经过五年文化大革命和“批陈整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林彪要求，把这一规定传达到卫戍区每个士兵，隔几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此外，林彪还建议把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等等。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我最后一次见林彪是1971年7月1日，那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上午10点钟左右，我和爱人去见林彪和叶群，叶群会后带着我们去见林彪。林彪正在客厅踱步，见我们进门便迎了过来。叶群轻轻拍着我爱人的肩膀向林彪介绍说：“这就是小李的爱人小刘。今天他们结婚，特地过来看看你。你看看，好不好呀？”林彪一边伸出手来与我爱人握手，一边连声说：“好，

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当林彪听说我爱人的父亲是开滦煤矿井下采煤工人时说：“小李是农民家庭，你是工人家庭，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好，好！”这天，我看见林彪又消瘦了一些，但精神还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说话也有底气。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从此踏上不归路。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

## 【书刊动态】

### 徐景贤《最后回忆》后记

• 葛蕴芳 •

遭受到景贤意外发病突然去世的打击之后，家人们忙于丧事并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沉浸在极度悲伤中难以自拔。后来逐渐接受现实、缓过神来。当发现景贤留下的一些遗物后，我决定要为景贤做些什么，便强打起精神，开始了搜集、整理遗稿《十年一梦》续集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仿佛依然与景贤相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品尝生活艰辛与苦涩。因为是在一起，自然也是温馨的。直到校阅完了书稿的最后一页，摘下老花眼镜，揉揉发酸的眉间，这才像是突然一下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这个空荡荡的家，剩了一个孤寂的我。

我抬头望了望景贤那幅挂在墙上的遗像，泪水又止不住流了下来。

2007年10月31日下午四时许，因突发急性大面积心梗，导致循环、呼吸系统衰竭，经120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景贤在家中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只字片言。

当时的我，心如刀绞，脑子里却是一片迷茫。一直下意识地不断呼唤着他的名字，仿佛他只不过是睡着了，我要把他叫醒。我要对他说，我俩生离的苦涩刚刚退去，好日子还没有过够，就此死别了吗？！心有不甘！我要对他说，作为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我们还有许多希冀和祝福的话要对儿女们叙说。我还要对他说，作为刚刚过去的那个难忘的世纪的见证人，我们总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更何况，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是他从提篮桥监狱回家时亲口答应过我的。他怎么能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就这么走了呢？！

我不停地抚摸着他那凉凉的面颊，梳理着他那依然显得黑黑的头发，我要叫醒他。因为我和孩子们都不能没有他。

女儿、女婿们闻讯赶回来了。泣不成声，流着眼泪，替爸爸擦洗身子，换上他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

亲友们闻讯赶过来了。致哀、告别，带着无尽的哀思和惋惜，下楼而去。

这一夜，我就靠在他身边，凝视着他安详而显得消瘦的脸庞，往事历历在眼前浮现……

我和景贤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1年8月，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因为市政工作建设的需要，被分配到我当时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使我们彼此由好感而相恋，五年以后，我们结婚了。

这一时期的景贤，由于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倍受领导上的重用和培养。工作之余，他喜爱写作，曾先后写出了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散文集《生命似火》等文艺作品和许多评论文章，颇受领导的赞赏和读者的好评。他与陈耘、章力挥合作完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剧本，还获得过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先是，一向被市委领导倚重的他，不知怎么的竟成了领导们逃避群众批判的挡箭牌和灭火机。常有这样的揪心事发生：市委书记、市长们东躲西藏，却要他出面去东推西挡。群众自然不答应，指责他是走资派的铁杆老保。后来，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写作班同事们的促进下，他终于醒悟，放下了正在替曹荻秋写的检查，造反了。

谁知当“老保”不得安生，“造反”了还是不得安生。1967年1月29日清晨，我单位里的同事电话告诉我，徐景贤于1月28日凌晨被一起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抓起来了。还说好像关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我赶忙去机关联络站找勤务组成员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头头都不在，有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人是被复旦红革会抓走的，是不是关在复旦，却说不准。当时机关联络站有人去复旦设法营救徐景贤，我即随之同去探望，终于在一学生宿舍二楼见到了他，看到他还算安全，问了些情况，我就回家听候消息。1月30日我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已到，其中第二条：必须立即释放无理绑架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景贤也打电话回家，说他已经回到机关联络站了。这时，我才放心下来。岂知，我这一生中，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坚持的苦难历程，却由此开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地发现已经当上市委书记的他过得并不快乐。别看他在场面上笑容可掬、从容不迫，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家里却时常心事重重，仿佛有天大的难事无法排解。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不开心，全都是为了市委领导间的同而不和。表面上叫亲密战友，实际上争权夺利、倾轧不断。他看不惯从原工总司提拔上来的一些新干部搞特殊化，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反映情况，张春桥却不予理睬。真所谓官场风云诡谲，冷暖自知。景贤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有做好官的心，却实在不是能做官的料。正因为如此，他这市委书记当得也实在辛苦。可惜，这辛苦多半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用在政治“内耗”上面了。

一晃十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还不满一月，一场大祸，突然降临到我们全家头上。时任市委书记的景贤，一夜之间被说成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后来，景贤被判十八年监禁的主要法律依据，竟然就是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一条！

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迷惑不解。那年的10月8日，多个渠道传来消息，说中央出事了，作为上海第一、第二书记的张、姚又迟迟联系不上。又过了两天，中央王、张、江、姚四个人被抓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而市委领导们至此仍没有收到党中央下达的任何正式文件和通知，因此，大家既紧张又疑惑，搞不明白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景贤为此到处打听消息，并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商量，召集民兵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0日下午，也是在没有任何明确交代的情况下，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去北京开会。景贤到北京后，当晚打回上海的第一只电话，就是通知上海市委，立即停止一切应变活动，稳定上海，一切等他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后再说。……

当我还在疑惑不解的时候，景贤却大包大揽的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为个人未来的命运考虑而患得患失？还是屈服于各种压力？还是因为在中央专案组宣布的上海第一批逮捕法办的十个人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心存幻想？

惊魂未定，还没有来得及与他商量、与他沟通，他便被专案组的人从家里带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不知带往何处，也不允许家属探视。接下来，就是抄家、搬家……当我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这破碎了的家庭时，一度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看到尚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年迈的公公、婆婆，咬紧牙关，承受命中注定的这一切！我想，我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党员，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早晚会有还景贤清白的一天！

惴惴不安中，到了1981年。就在王、张、江、姚案由北京特别法庭审结后不久。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通知我去监狱医院探视徐景贤。来人简单地告诉我，徐景贤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要我去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赶紧收拾了一些必要的东西，跟着他们就走。因为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要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久不见，眼前的景贤，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瘦得脱了形，神情呆滞，看到我来，像陌生人一般，没有丝毫愉悦的表情。见他这个样子，我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我曾经有过的一些疑虑，终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特别法庭对王、张、江、姚一案的重判，彻底毁灭了他有可能因为态度好而受到从轻发落的幻想。他终于明白了，在对待王、张、江、姚一案的态度上，无论他怎样积极表现，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配合乃至迎合专案组的调查，无论他怎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其结果，都是一个样，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因此而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他本想争取的较好结果，彻底的失望了。

他木然呆立在病房的铁窗前，嘴里说着看到大树开花啦这样的胡话。猛然间，我想到了疯疯癫癫的马天水。我害怕极了，我的心抽搐着。此时此刻，去对他说党的政策是怎样怎样的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对他说，会开花的大树当然有了，那是广玉兰呀。我猜，你是想女儿了吧？家里的人，爹爹、嬢嬢（指继母）和两个女儿都平平安安的，就是非常想念你，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家。那天，我特意给他带了一些有很多风景画的画报，想让他放松放松心情。我一边翻动着画报，一边对他说，我俩结婚后，忙东忙西，总也没有机会一起出去走走。将来，等你回家后，我们一定要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游它个遍。我嘱咐他，身体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会等着他回家，不管等多久，直到再相聚首的那一天，谁也不许失约。

自从我去探视过以后，景贤的病情有所好转。也许是亲情在起作用？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在乎亲情的人，也许是他终于从彻底失望的牛角尖里钻出来了？因为，我还知道，他对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只是需要假以时日。记得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曾互相激励，要时刻准备着去经受人生之路上风霜雨雪和荆棘丛生的考验。……可能还有许多的也许，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他毕竟还年轻，经受的打击虽然沉重，还不至于走上马天水那条路。这是不幸中之万幸。虽然团聚还在遥远的将来，人在就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景贤从医院转至监狱服刑。他的刑期长达十八年。从他入监的那一天算起，监狱方规定，家属可每月探一次监，会见时间只有一刻钟。监狱的所在地离家很远，路上来回得花三、四个小时。但是，为了能够见上一面，为了能带给他一些精神食粮（书报等）和物质营养品，就算路程再远，就算天上落铁，我也绝不放弃。因为，相见虽然短暂，却是我们彼此能够在艰难岁月里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的精神支柱。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长期来独自挑起一副家庭重担，时常会产生再也撑不下去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在探监的时候，难免有所流露。景贤就会拿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劝慰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是最触动我心境的一句，只要这句话一出他口，我便抑止不住满腔的辛酸，泪如泉涌。这时，景贤想用他的手替我抹去眼泪，

但冷酷的铁栅栏生生地将我们隔开。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眼神中，我们都无可奈何的读到了这样的五个字：“但愿人长久”，是啊，我和他，除了还有这一点点的愿望外，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了。

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而已。到了1992年，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使景贤原本就有的胃病、高血压未见好转，又加上长期蹲监狱睡地铺而得的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真是雪上加霜。我也是心力交瘁，实在感觉支撑不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下，我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当年，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名。邓颖超同志对景贤也是有所了解的。在信中，我向她反映了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以及入狱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情况，请求有关方面网开一面，允许他保外就医。没想到，邓颖超同志的批示意见很快下达到了上海，这一年的六月下旬，监狱方同意景贤保外就医的申请，但提出，在刑期未满的三年里，一是他的生活费、医药费由家人自理，二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在我签字同意后，景贤才获假释回家养病。

景贤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中，家庭的变故可想而知。老父亲久病在床，他没能陪伴侍候，更无法尽到作为儿子养老送终的义务。两个女儿结婚成家，他也未能到场祝贺……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俩终于坚持到了再相聚的这一天。他离家的时候，一家还只四口；他回家的那天，已是全家八口围在一桌吃的团圆饭了。两位女婿，婚前婚后都曾陪着我去探过监，两个外孙，虽然名字都是他起的，而且也偶然带去见过外公，但终究小孩太小，印象不深。这时，八口人，三个家庭，团聚在一套三室的小居室中，大人们，甜酸苦辣的滋味涌上心头，悲喜交加；孙辈们，用陌生的眼光偷窥着还满头黑发、他们却要叫他外公的人。此时的景贤已是年届花甲之人了。养好身体，含饴弄孙，是我们全家交给他的两大任务。尽管我们的家居相当拥挤，经济也不宽裕，但有他乐融融地陪伴在我们身边，我感到安全、放心，感到心情无比愉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1999年，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后，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期满。按照宪法规定，他应该是享有出版、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的公民了。同时，他在保外就医后，经过全家人的悉心调养，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他喜爱写作的愿望重新燃起。他对我说，他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反思“文革”，把这段历史史实公之于世，为当政者鉴，也对后人有个交代。我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他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起落之后，意志未消，斗志尚存，我更是高兴。

在克服了资料缺失、行动上受到相当限制等种种困难，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于2000年完稿。完稿后费尽周折，几易出版社，终于于2003年底在香港出版，成为香港十大政治畅销书，且名列前茅。读者反响热烈，有褒也有贬。有的说，他违避了一些不该违避的事情；有的说，他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但多数读者的意见，认为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在众多反映“文革”的书籍中，可算是一部信史。而且对他的可读性也十分赞赏。这使景贤大受鼓舞、大为振奋。他在认真的思考了朋友们的批评意见之后，对我说，他要接着再写，这次，他要把自己摆进去，写得更真些，想得更深些。……

天不佑我！在《十年一梦》出版后的2004年、2005年两年里，景贤因右耳前庭疾患引起眩晕，连续两次住院开刀，手术不算大，但都是全身麻醉，这对一个时年已过七十岁的老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两次手术以后，眩晕却仍未解决，加上他原有的腰椎、关节等多种疾病，从此，眼看着他日见消瘦，背更驼了，再也不能方便的独自站立行走了，非得依赖拐杖和旁人扶持。然而，即使是在病痛不断折磨他的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坐起来，就会趴在电脑桌前，用电子笔，笔耕不止。经常是，深夜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我劝他，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他却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对党史负责，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让后人在研究中国文革史时有所参考。却万万没有想到景贤的第二部书稿还没有最后完成，心愿还未实现，他却急匆匆地

突然离我们而去。

2007年11月6日，在景贤去世六天后，我们全家与部分亲友们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提供的遗体捐献告别场所，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五十多年来相依相偎、相濡以沫的亲人，从此永诀！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一生是担忧多于平安，患难多于欢乐，离散多于聚合。徐家的族人想为景贤编辑一本生平经历的纪念册，以志纪念。亲友们的眷眷之情，让我们母女刻骨铭心。……

景贤去世时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我又怎能忘得了他深夜伏案写作的情景？！又怎能忘得了他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语？！又怎能不去想他要对后人有所交代的心愿了了没有？！于是定下心来，把景贤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大略整理一遍。终于，陆陆续续的发现了保存在电脑里的一些文稿，但愿景贤的这部遗作，能为“文革”提供更多真实的思考。

葛蕴芳

2009年10月31日

补充：

前数月在朋友叙谈中偶尔听到“当年党中央确实是下达过对徐景贤决定不予刑事处理的红头文件，是陈丕显对曾来接管上海市委的领导彭冲拍桌子、发脾气，要求对徐景贤判以重刑，彭冲等领导向中央回报，……”。又据另一位知情朋友说：“陈丕显拍了桌子之后，上海方面向中央汇报，上海是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文件中没有作出对徐景贤给予刑事处分的决定，上海不好处理。……”但最终还是一律从严惩处。这也就是我们所遭遇和演绎了几十年的一场大悲剧的来龙去脉！

葛蕴芳

2012年5月1日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

【当事者言】

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

• 徐景贤 •

（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三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上海也跟着乱起来了。六月十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公开点名批判八名党内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接着，各单位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挨整、遭受批斗，社会上的抄家、打砸抢成风。

张春桥、姚文元去了北京，临走前，张春桥把上海市委写作班交给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领导。可是，因为复旦大学运动的兴起，杨西光分管教育卫生系统，忙于处理复旦大学的



事务，就顾不得我们这边的工作了。我记得，这段时期他也曾和我一起到《解放日报》、《文汇报》去为几篇重点文章定稿，但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感到他的日子比较难过。

#### ◇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我们写作班随后写的一些大批判文章，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斗争方面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红卫兵就开始南下串连。陆续到达上海的有大学红卫兵，也有中学红卫兵，都是自发的，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到上海后散住在各个学校，并到市委上访，要求了解上海市的运动情况。市委成立了专门的接待站，也指定写作班派人参与接待，我就同意把从华东师大选来的写作班文学组成员王绍玺，调去担任红卫兵接待站政宣组的组长。我自己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红卫兵。

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市委办公厅还要我安排写作班的成员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大门口去值班，历史组的人值上午班，文学组的人值下午班，有的人还要值通宵班，挡住来势汹汹的红卫兵。

可是，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市委大门口就越来越乱。北京红卫兵传来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主张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他们说：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以后自然会有结果。可是上海市委组织了大批工人和农民到市委延安西路大门口，和北京红卫兵展开大辩论，上海一方的观点是：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的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不应该“炮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

我们守在市委大门口，和上海工人持同样的观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的学校等基层单位串连，认为上海的运动是捂盖子，和前一阶段的北京情况相仿，因此强烈要求上海市的领导人接见表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市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到场，和三千多名北京红卫兵见面。曹荻秋讲话刚刚结束，北京红卫兵就冲上台，指责市委把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见面会变成了声讨会。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红卫兵的代表来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门口，要求市委单独接见，履行昨天大会上的承诺，双方发生了冲突和争执。北京红卫兵越聚越多，坚持了好几天，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有一位直接指挥这次活动的当事人，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当面找到我，向我详述了事件经过。他姓孙，当时是来沪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这一组织的红卫兵。为了力求保存事实的真相，我把他的口述内容记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四年级。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以“北航红旗”红卫兵的身份，到上海串连。我们感到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要求面见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可曹荻秋就是不见，我们就在市委大门口静坐。

从九月一日到三日，市委门口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有大学的，有中学的，都来声援我们。市委调来了许多工人队伍、农民队伍，把我们包围起来。有的老工人、老农民还哭着劝说

我们，说解放以后亏得共产党，才使他们翻身得解放，要求我们把队伍撤走，不要为难上海市委。到后来调来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有几千人，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和我们辩论，指责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还发现背后还有市总工会的领导和区委书记等到现场指挥。他们把我们当作“洪水猛兽”，不让我们吃饭，甚至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晚上睡在马路上，躺在大雨里，坚持不散。

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设法挤出包围圈，这天晚上，我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彭小蒙三个人在南京西路静安寺的一个转角上碰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贺鹏飞说他要乘飞机回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向江青阿姨汇报上海市委的情况，只是我们几个人身边都没有钱，没法买机票。贺鹏飞就说附近有一个有钱的资本家，去抄他们的家，抄到了钱买飞机票赶回北京去。我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去抄了家，怎样回了北京的。

我返回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越来越激动，他们主张冲进去，我不主张冲。市委的值班人员看到我是领头的，就把我请进市委机关办公室，拿出很多面包请我吃。我坚持要求曹荻秋接见，遭到拒绝。我回到马路上告诉大家上海市委的态度，这时已经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按捺不住，就集体往市委机关里冲。机关工作人员拼命阻挡，当场发生了冲突。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冲了进去，有的还一直冲到办公大楼的楼顶，树起了旗帜。这件事震动了全上海，这就是所谓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 ◇ 红卫兵打、砸、抢和“漕溪北路事件”

上海市委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中央发电报，指责北京红卫兵太无组织，搞乱上海，冲击市委，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市委还组织老工人、老劳模象杨富珍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因病一直处在幕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又直接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反映北京红卫兵来沪的情况。接着，上海市委就张贴出了大字报，说周总理在电话中表态：“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于是，又一次引起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激烈争论。

关于周总理的电话真假，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时，在预备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曾经当面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我是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为当时它毕竟领导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嘛，但我决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因为谁都犯过错误，连我都犯过错误。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呢？”

结果，“周总理的电话”仍阻挡不了来势汹涌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的党政机关。在上海市委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决定一方面组织各地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另一方面决定有组织地安排北京红卫兵去外地串连。于是，就在九月十日由国务院组织第二批红卫兵来上海，人数达几万人，其中很多是干部子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扬言：“这批红卫兵是来保上海市委的！”

这批红卫兵统称“南下兵团”，分成十几个中队。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到达非常重视，专门派车队迎接，由摩托车开道，一路十分威风。他们一到上海，就大肆宣传“血统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市委安排他们到各区、县，为他们召开座谈会。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海怎么批判牛鬼蛇神？怎么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怎么抄家？有哪些成果？等等。总之，他们的矛头大都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

同时，上海本地的一批红卫兵也和他们结合起来，有些高干、军干子弟闹得很凶，象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带着一批红卫兵，穿着长皮靴，开着摩托车，挥舞着皮带到处打人。市委怕北京红卫兵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不敢管束他们，乘势尽量把他们引到社会上去。而这批来上海的红卫兵有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也不会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对准自己的叔叔、伯伯们，因为要保护他们老子的利益。这样，掌权者和红卫兵双方都把火力集中用来对付社会

上的“牛鬼蛇神”。这些红卫兵在上海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抄家和打、砸、抢，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随意打人，造成一个所谓“红色恐怖”的局面。

我很反对红卫兵打人，就组织写作班历史组和文学组的成员写大字报，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写完后由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连夜张贴到北京红卫兵居住比较集中的黄陂路等处，向他们作宣传。这批红卫兵在上海闹得天怒人怨，市委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反映，中央就趁国庆节到来的机会，通知北京红卫兵回去过国庆，这总算使上海在国庆节前后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在上海的打、砸、抢行为，还酿成过一起“漕溪北路事件”，出了两条人命，引起上万人的围观和辩论，市委不得不派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前去处理。漕溪北路是在上海徐汇区的一条马路，聚居着很多居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有八名外地红卫兵，都是军干子弟，有几个是师长、团长的儿子，来到上海扬言要整“牛鬼蛇神”。他们闯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看到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上张只是小业主），又以张的儿子张俊发在工作单位天马电影制片厂表现不好为理由，找到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干部，要求提供材料，并直接上门“教训教训”这一对父子。然后，他们就闯进张家，严刑拷打张炳生父子，把他们两人活活打死，还砸烂了屋内的家具物件。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有上万人天天围堵在漕溪北路抗议、辩论、贴大字报。市委怕局面失控，赶紧派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前去平息事态，并派市公安局林德明副局长配合我。

我到漕溪北路天福里现场去调查的时候，只见这一条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激动地议论，有的指责打人者手段残忍，有的埋怨里弄干部向红卫兵提供了材料，还有的责备派出所严重失责。为了平息局面，我们决定先由公安局对打人者和有关里弄干部、民警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但是，事态还是无法控制，在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的策动下，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漕北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人大会，从此在上海刮起了一股批斗里弄干部之风。一直蔓延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要文汇报发表了《不准批斗里弄干部》的社论，才算把这股风煞住。漕溪北路事件中的打人者后来也移交给原籍公安部门处理。

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市委也很重视写作班所能起的特殊作用，特意安排我出席全市的国庆招待宴会，还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在十月十九日文化广场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国庆节期间，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找我，说市委决定从写作班派一个人到北京去，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常住在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专门负责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和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及时反馈给市委，供市委作决策参考。由于历史组朱永嘉在《海瑞罢官》批判期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较为熟悉，最后市委决定派朱永嘉前去担当此任。

#### ◇ 我成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随着运动的发展，市委分配给我们的额外任务，把我们推上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例如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上海市文艺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都起来了，他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要求市委领导到场，可是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都推诿不去，叫我代表市委去。那些造反派见市委领导都避而不见，怒气冲天，就拿我当作批斗靶子。市委派车送我到文化广场，可一进了会场，我就变成了对立面，被推搡到台前。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我站在台上听，还要我表态，结果我成了整个批判会的“斗争焦点”。他们说：“丁学雷，你是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市委把你送到这里来做挡箭牌！”我想：这话不错，我真成了一块到处替市委抵挡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了。

电影厂的造反派在大会上给我拍照示众，手里拿着拍电影的聚光灯，把灯具放在我脚下的地板上往上打光，拍出来的照片使我的脸拉得很长，脸上还有一团团的黑影，显得很丑陋、很恐怖。他们后来还把这些丑化我的照片拿给我看过。我心里直埋怨市委领导，觉得自己是代人受过。造反派还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是有理的，我一个小小的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没有得到授权，既无法承认他们的组织，又不能批经费，更不能签字，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他们轰了我一通，把我批判一番，就打发我回去，我心里感到十分委屈。

回到市委，见到市委书记们、常委们，一个个苦着脸坐在康平路小礼堂里，惶惶不可终日。这里、那里，各条战线都要开批判会，都指名要他们去。我感到，他们的日子固然难过，我自己又何尝好过呢？从前我们在写作班参加“战斗”的时候多么光荣，能够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写作任务，能够直通中央，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有相当一个时期我的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我很想直接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对于北京传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始时我是将信将疑的。那时我在市委门口值班，北京红卫兵把《炮打司令部》抄成大字贴在接待站里。我很奇怪：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所以一开始怀疑它不是真的。我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渠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觉得不正常。但看看这份大字报的口气完全是毛主席的，我真有点晕了。去问市委领导，他们也不否认有这张大字报，而是默认了。我便认定毛泽东的大字报是真的，但奇怪它为何不在党内正式传达。我又想：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我在思想上、感情上还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我多么想直接找到张、姚呀！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以后，从不跟我们主动联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文艺界造反派的围攻，我曾为他几次解围，从造反大会会场上把他解救出来。他很感激我，对我说：“你要与姚文元多联系，多一点信息，我们现在很被动。”杨永直知道我和姚文元交情不错，让我在市委宣传部给姚文元多打电话，部长室就有保密的电话红机子，但打过去姚文元不接。多次打电话打不进去，说明姚文元不愿意听电话。只有一次，于会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剧现代戏，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要把他揪回来，这事闹到市委宣传部，究竟怎么处理？杨永直急死了，要我以于会泳有急事要请示姚文元为理由打过去，姚文元总算接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于会泳前一时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样板戏的，不要随便揪人。姚文元在电话中给于会泳做了一次证明，才避免了于会泳被揪斗。

我想，姚文元不肯接电话，总有他的理由。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守口如瓶：江青怎么接见他？毛主席怎么审改他的文章？他从不向写作班的成员透露。调到中央以后，他更是滴水不漏。就在我为了于会泳的事情和他通电话时，他也表露过这个意思：“我这里不方便直接跟你们经常联络。”我知道那时中央政治局已经不大起作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文革的决策机构，我打电话找姚文元，主要是为了打听中央文革的精神，他也清楚我的意图，所以对我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心里明白，因而更加不愿意多找他。

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无法直接连上线，朱永嘉派到北京后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直接接触，所以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市委写作班成员也是我的苦闷期，日子比较难过，文章也很少写。因为报纸上登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战线方面的斗争了，而是直接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了。分管写作班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被红卫兵到处揪斗，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整个写作班单独悬在那里，所有成员除了参加学习、开会、接待、值班以外，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我还被曹荻秋叫去参加市委常委会，代他起草检讨，以应付中央和红卫兵的责

询。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 我和北京红卫兵交上了朋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和第一、第二批大不一样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干部子弟，没有“贵族血统”，而且在北京自己的学校里都经历了党委和工作组对他们的压制，后来又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因而有着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来上海不是去社会上扫“四旧”、揪所谓的“老吸血鬼”，而是把矛头直指上海各级党的领导，重点批判的是镇压群众、打击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他们比别的红卫兵要早些来到上海，早在八月份他们就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支持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以后又到上海文艺界、医务界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介入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和青年报社的运动，支持那里受压制的造反派。他们成立了一个“齐卫东战斗队”，写了许多《一评造反派》《二评造反派》的文章，分析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在上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他们和那些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同，他们从不参与打、砸、抢和抄家，而是经常在海关学校和华亭路一个医务界的据点里找人谈话，研讨问题。他们能言善辩而又勤于思考，很快赢得了我的好感。

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在红卫兵接待站遇到了我，知道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时对我还抱有戒心，经过几次接触，发现我不是党的高级官员，而只是市委写作班的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就和我逐步接近起来。他们约我到“齐卫东战斗队”住的海关学校去，给我看他们撰写的文章，邀我到华亭路他们的工作据点去参加辩论沙龙，给我讲述他们的南下理念。甚至还让他们身边的中学红卫兵找到常熟路瑞华公寓我的家里来，给我送各种资料。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教育。

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我对他们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随便“炮打”，还是应该分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我们会犯一九五七年右派犯的错误。

他们说：今天的形势和一九五七年不同了，那时资本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共产党的政权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现在则是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绝对巩固了，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毛主席在“二十三条”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和反右派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根本不同。

我说：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不理解，对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的形势不适应，所以执行了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一概“炮打”。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

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我说：这样搞法岂非天下大乱了？

他们说：对！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问：那末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帮助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我至今还记得：“齐卫东战斗队”的许小昆在和我辩论的时候，目光灼灼，神态坚定，他直盯着我的双眼逼问：“你愿意做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的工具，还是做一个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饭食，晚上睡在教室里的硬课桌上，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鼓动群众，就像“五四”时期南下宣传的北京大学生一样。我暗自思忖：他们图些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图，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佩服这一些红卫兵和大学生们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而我也不满意一些人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指手划脚的作风，所以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奉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之命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了她的一系列讲话，对她抱有成见，根本没有和她见面。我宁愿到海关学校的小屋里和“齐卫东”们促膝谈心，也不愿意听“老佛爷”的喋喋不休。

说实话，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小昆更不会想到：就是他的一个电话，使我和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接上了头，从而引出了一场关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大争论，直接惊动了毛泽东，并且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

本期编辑：  
胡海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